

# 认知语言学的理论分析与展望

方环海<sup>1</sup>, 高明乐<sup>2</sup>

(1. 厦门大学 海外教育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2. 北京语言大学 英语教育中心, 北京 100083)

**摘 要:**近十年来, 认知语言学研究在理论演绎与描写分析方面都取得了很大进展, 目前认知语言学虽然已成为自然语言分析与研究的一种重要理论, 但缺乏更为深入的个案研究, 在对认知语言学的本体认识方面也尚有欠缺。通过对认知语言学的学科界定、认知属性等角度的述评, 可以较为系统地整理出其研究方式和理论特征; 通过认知语言学与形式语言学的比较, 也能够对其理论导向与发展趋势作出分析与推测。目前认知语言学在理论与方法上还远远没有成为一个统一的稳固的理论系统, 仍然是一个动态的研究框架。

**关键词:** 认知语言学; 学科特性; 认知; 语境; 语义

**中图分类号:** H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38- 0460(2010) 04- 0013- 07

认知语言学起源于 20 世纪 70 年代末、80 年代初。从历史渊源看, 它认为形式语言学的研究范围狭窄, 缺乏对语言的社会与交际功能的认知, 于是从形式语言学的研究阵营中分离出来, 并提出自己对语言与语言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认知语言学主要集中于语言作为组织、加工和传递信息工具的研究, 也正基于此, 对语言范畴进行概念化与实验分析才在认知语言学领域里居于首要地位。<sup>[1]</sup>在这里, 学者们并没有把语言的结构形式作为一个自主的内容来研究, 而是将其作为概念组织、范畴化原则、加工机制, 甚至是内在经验与外在环境的影响结果来进行分析与解释的。

回顾刚刚过去的 10 年, 认知语言学研究在理论演绎与描写分析方面都取得了很大进展, 可以说, 目前认知语言学已经成为自然语言分析与研究的一种重要理论。在这里, 我们主要想结合认知语言学的研究内容和方式, 介绍其理论的特征, 并通过与形式语言学的比较, 对认知语言学的理论导向与发展趋势进行评述。

## 一、认知语言学的学科界定

在认知语言学看来, 语言是人类认知能力的一个重要构成, 因此, 自然语言范畴化的结构特点、

收稿日期: 2010- 04- 20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语言机制与脑区功能关系研究”(03BYY013)

作者简介: 方环海, 男, 江苏沭阳人, 厦门大学海外教育学院教授, 文学博士; 高明乐, 男, 山东安丘人, 北京语言大学英语教育中心教授, 文学博士。

语言结构组合的原则、句法语义的概念接口、语言运用的经验和实验背景以及有关相对性和概念普遍性等就成为认知语言学关注的主要问题。严格说来,对这些问题,目前还没有任何一种单一的、一成不变的理论学说能够完全涵括。从这个意义看,与其把认知语言学看做一种单一的语言学理论,还不如将它看成是始终处于变化之中的一个动态的理论框架。或者说,认知语言学的学说还只是一种语言学的研究思路和视角。当认知语言学被看做是一种范畴的时候,它也具有一个家族相似性结构,相较某种单一理论而言,这一结构形成了很多互相交叉的语言研究方式。尽管认知语言学还未形成一种完整的理论,但仍然可以在认知语言学的理论框架内进行多种形式的语言研究,探索人类语言的普遍性特征。

从术语学上说,“认知语言学”与“认知的语言学”是明显不同的,前者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形式存在,而后者则是将自然语言作为心理现象来研究的手段与方式的统称。<sup>①</sup>“认知语言学”仅仅是“认知的语言学”中的一种而已,可以和其他类型的语言学区分开来,那么,应该如何确立认知语言学的学科属性?

简而言之,认知语言学就是从认知功能角度对语言进行研究的学科,这里的“认知”一词非常重要,面对外在世界,“认知”在信息结构中承担着非常关键的中介角色。其实,从认知的角度看,认知语言学与认知心理学对世界的观察角度与研究路径是完全一样的,二者都假设:我们与外在世界的相互作用都是以人类心智中固有的信息结构作为中介。很显然,认知语言学的核心在于将自然语言作为人类组织、加工和传递信息的手段。语言也因此被视为一种对外在世界的认识,一种意义范畴的结构体,是帮助储存旧信息、处理新经验的工具。

认知语言学最引人注目的一个特征就是其对语言意义的高度关注。从总体上看,认知语言学应该具有三个基本特征:1 语言分析中,语义分析具有独立性;2 语言意义具有普遍性;3 语言意义具有隐喻性。

其中,第一种特征只不过是强调在语言的基本功能里含有意义,而其他两种特征则说明了认知语言学的语义学性质。就“认知”视角而言,如果说语言的基本功能就是范畴化的话,那么语义就是语言学最为根本的研究现象。至于第二种特征,即语言意义的普遍性,则是语言范畴化的结果。如果说语言是对外在世界的一种范畴化系统,那么,就无需去假定语言意义还存在着系统的或者结构的层面,从而将其与外界认识和语言形式相关联的其他层面区别开来。第三种特征,语言意义的隐喻性的意思是:语言的范畴化功能利用语言的结构对外在世界施加影响,语言本身并不能像镜子一样客观反映外在世界的真实性。语言意义具有隐喻功能的思想,在哲学上已经有理论的详细阐述,也是认知语言学在认识论上的主要观点。在经验主义看来,认知语言学对有关人类知识的认识特别强调这样一种观点,即我们的机体器官体验以及个体和共同经验决定了人类的理性。

通过讨论,可见认知语言学学科的界定与研究范围的划分具有某种程度的任意性。从学术研究上看,认知语言学在建立理论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开放性与动态性大大增加了其理论对研究者的吸引力。形象地说,认知语言学特别像是一座拥有很多单元的大楼,能够吸引有不同兴趣的研究者的注意,他们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进入其中任何一个单元。不过,这同时在理论上也很危险,因为进入任何一个单元都容易失之片面。当代其他理论语言学产生了很多理论上的导向与趋势,而认知语言学则是兼而有之,而且通过整合,挖掘出比当代其他任何一种理论语言学框架更多的内在学术潜力。

---

① 语言是一种人类认知现象,这也是未来语言学必定向认知科学发展的理由,认知语言学应成为语言学未来发展的主要趋势。为此笔者在一次国际会议上请教过哈佛大学语言学系黄正德教授,他认为假如认知语言学没有误入歧途的话,这一研究趋势应该是对的。在此特别感谢黄正德教授的指导。

## 二、认知语言学的“认知”

正是由于认知语言学的根本特性, 认知语言学家才极力宣称他们是在从事探索人类认知本质的事业。其实, 在这一点上, 形式语言学派中生成语法的研究旨趣和认知语言学完全一致。Chomsky认为, 人类语言的本质就在于人类成员的大脑之中存在一种由遗传决定的、通过生物性天赋而得来的语言机能 (faculty of language), 这种机能就可以看做是语言的心智器官。<sup>[2]</sup> 关于这一语言机能的理论研究就可以称为普遍语法。生成语法所代表的普遍语法研究的目的有二: 1. 为具体语言提供明晰的理论, 力图精确地表达获得某一种具体语言的人关于这一语言的知识; 2. 解释人类这种语言知识是如何获得的。

对语言研究而言, 认知语言学和形式语言学看起来确实是两套不同的研究路数, 而且在认识论上对自然语言的看法各异, 但二者一致认为, 并不存在缺乏心理表征的所谓认识与知识, 这种心理表征在主体与客体的认识论关系上担负着一种极其基本的媒介角色, 而且这也成为它们共同的认知来源。同时, 根据认知语言学的观点, 自然语言精确地体现出对外在世界的范畴视角, 而生成语言学家则走得更远; 他们认为, 与其把自然语言看成是主体与客体之间关系的中介, 还不如直接将之看做是认识论关系中的客体。认知语言学关注的是对世界的认识, 研究的也是自然语言如何对之施加作用的问题; 而生成语言学家关注的则是语言的知识, 研究的是这种语言知识作为一种认知媒介是如何被人们习得的问题。

近年来, 形式语言学朝着最简方案 (Minimalist Inquiries) 的方向发展, 其目的是解释语言的习性 (learnability) 问题。认知语言学所关心的也不外乎内在的语言认知这样的问题。由此可见, 语言习得的研究之所以能够成为当代各种学派的语言学研究的焦点与中心是可以理解的。在这点上, 认知语言学与形式语言学都共同关注心理上这些由知识组成的结构体。<sup>[3]</sup> 对“认知”的研究方法而言, 自然语言本身就是由这些结构组成, 相关的知识也就是对世界的认识; 而对“形式”的研究方法而言, 其思考的却是语言的知识, 相关的心理结构是由那些先天的使得人类能够习得语言的能力所构成。由此可见, 形式语言学关注的是人类语言知识的本体, 认知语言学关注的则是人类通过语言手段获得的所谓知识。(见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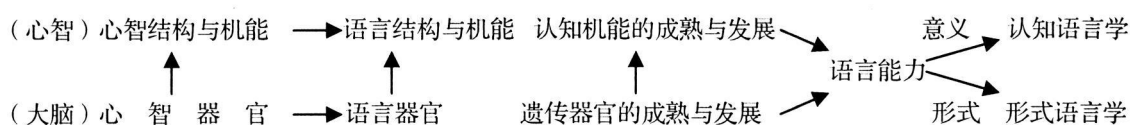


图 1 认知语言学与形式语言学研究异同示意图

从形式语言学建立之初, Chomsky 就没有将语义放置在语言学研究的核心位置。因为语言的形式与语义之间的对应关系很不精确, 很难作为语法描写的基础, “语法自主而独立于意义”, 如果一味遵循语义的线索, 就难以做到对语言结构的理解与概括。然而, Chomsky 自己也明白, 句法形式与语义特征之间的对应关系是客观存在着的, 他主张, 这些对应关系应该在更为一般的语言理论里加以研究, 语言理论包括语言的形式和意义, 所以他认为, 整个生成语法规则系统就应该由句法、音系、语义等三个部分组成。<sup>[4]</sup>

后来 Chomsky 在最简方案框架下, 将自己理论中的内在性的语言认知系统只分为语音层面与概念层面, 越来越接近传统语言学的认识, 语言认知主要来自内在于大脑心智的两个向度, 即语音向度上传递的认知信息 (听觉通道)、意义向度上传递的认知信息 (视觉与听觉通道)。以索绪尔为

代表的结构主义认为,语言具有声响形式与概念意义两个方面,其本质由语音与意义组合而成,这符合人们的语言直觉,Chomsky的分析也是如此,他的理论框架包括语音表达式(PF)和概念逻辑表达式(LF)。(见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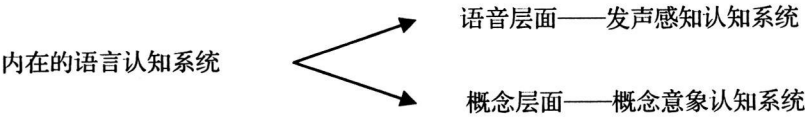


图2 语言认知系统分层图

从本质看,认知语言学的“认知”与形式语言学的“认知”完全是两种研究方式,也正因为如此,认知语言学在与形式语言学的对抗中得以进行理论观点的提炼与体系的构建。首先,认知语言学注重对具体语言现象做充分的描写,并且大量容纳那些限制生成语言学理论延展的语义和功能因素。<sup>①</sup>其次,认知语言学大力发展语言习得的非自主理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语言习得常常包括某些非语言的因素和机制;二,语言习得过程中,存在着一些制约自然语言的强制性因素,这些因素来源于认知系统或者其他语言系统。<sup>②</sup>

总之,要想充分理解与准确把握认知语言学表现出来的复杂多样的形式,关键要了解这么一点:在认知语言学看来,语言的知识不仅包括语言本身,同时也包括了以语言为媒介的对世界的认识。与形式语言学相比,认知语言学对知识类型的研究焦点发生了转移,加之认知语言学的经验主义本质,我们可以说,认知语言学是继20世纪50年代生成语法“第一次认知革命”以来的“第二次认知革命”。<sup>③</sup>

### 三、认知语言学的发展趋势

20世纪的一些语言学理论,尤其是以生成语法为代表的形式语言学的基本特征是“去语境化”,即分析语料脱离具体的上下文语境。倘若把索绪尔理论作为观察点,大致就可以把握住20世纪语言研究中“去语境化”背后的逻辑。索绪尔对语言与言语的二分,开创了内部同质的语言学研究,为语言学研究打开了一扇新的窗口。一方面,语言可以界定为一个社会系统,一组社会集体规则的集合,一个为社会集体拥有的约定俗成的共同准则;另一方面,言语是一种个人的心理活动,

① 认知语言学是以自然语言的运作假说为其特征的,语言的任何一种运作假设,都会与其他在语用上与功能上相兼容的语言学理论并存,其中大量的语言现象都能够从语义和功能两方面得到比较充分可信的解释。也就是说,每一种特殊的语言现象的出现,都有着认知作用与活动的基础,这大大削弱了对可能出现的句子的预见性和限制了对句法结构做先验性的形式化假设。

② 认知语言学在这点上与形式语言学确实针锋相对,形式语言学坚持句法自主,认为不能把符合语法的句子的集合和语言学家在实际调查中获得的话语资料等同起来,也不能将符合语法的(grammatical)这一概念与有意义的(meaningful)的概念等同起来,同样也不能把符合语法的含义与概率统计的接近率等同起来。因此,在形式语言学的理论中,语法之所以能够独立于语义,人类之所以具有产出与识别符合语法的话语的能力,也并不是建立在什么概率统计之类的概念上。参见吴刚:《生成语法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34页。

③ Chomsky被西方学界认为是“认知革命”的领军人物之一,创立于20世纪50年代的生成语法还被认为是触发这场革命的重要因素,对于这场“认知革命”,Chomsky一直认为它不过是对16-17世纪西方思想史上“第一次认知革命”所产生的思想、成就以及不足之处的进一步思考与探索,因此他也将之称为“第二次认知革命”。“第一次认知革命”则是当年“科学革命”的一个组成,那场“科学革命”大大改变了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尤其是对人类知识本质的理论和认识的思考与探索。本文认为,Chomsky代表的生成语言学应归入第一次认知革命之中,而Chomsky之后发展起来的认知语言学则归属于第二次认知革命。

这些言语活动是由规则表征出来的要素单位所构成的集合体。语言与言语二分存在的问题是,在二者的差别与分歧之间,难以找到链接语言的社会因素与心理因素、集体与个体、语言系统与系统应用、语言规则与规则应用之间的中介。

Chomsky的生成语法学也作了语言能力与语言运用的区分。他强调指出,语言学家面临的事实是,某一种语言的说话人在观察了语言中比较有限的一些话语的集合以后,就在这极其有限的语言经验基础上,可以讲出数量无限并且能够为言语社团其他成员理解接受的新的话语。<sup>①</sup> 语言研究的目的是努力构建一个明晰的形式化的语言学理论,来解释人类在经验促发下语言知识的获得过程,以及语言知识能够进行创造性使用的客观事实。无论是结构主义还是生成语法,它们研究的“去语境化”都是由各自的语言观决定的。

目前,语言学发展出现了新的趋势,语法研究越来越倾向“语境化”,其中认知语言学就体现了比其他任何一种理论语言学更多的“语境化”的研究发展趋势。把基于交际的语言的社会属性归入语言的语境范畴,这与对语言的种系发生学上的普遍性思想认识的转变密切相关。其实,粗略地从1985年算起,语言学研究好像都把语言研究与因生成语法理论兴起而中断的语境方面的研究紧密联系起来。那些原本处于语言学边缘的学科,现在也与语言学本体研究紧密相连。通过考察相关研究的发展状况,就能够看到认知语言学在其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首先,将词汇学重新引入语言学研究恐怕是一个普遍的趋势。就认知语言学而言,其语境功能在构式语法理论里表现得最为充分。这一理论起始于这样一种认识:句法与词汇并非截然分立,而是二者之间存在着一个连续统,所谓的“构式”,是指包含词汇材料的句法结构。事实上,即使在生成语言学领域内部,这一理论趋势也很明显。这一趋势似乎说明,语言规则的描写其实可以应用到对词汇的描写。词汇主义的研究导向是运用形式化手段研究语言。如生成语法的投射和题元角色理论、词汇功能与法的词汇中心角色理论,以及从中心语驱动短语结构语法(Head-Driven Phrase Structure Grammar,简称HPSG)理论中发展而来的词汇驱动语法皆是如此。<sup>[5]</sup>

其次,认知语言学试图将意义置于语言学理论体系的中心地位。这一理论导向展示出对意义的高度重视,也是对目前一些过分重视形式的语言理论的反叛与纠正,而且认知语言学理解的“意义”远远突破了语言哲学上的语义真值,具有更为广泛的学术含义。语言结构表现的就是概念化,这就是说,概念化才是语言结构的核心内容,概念化比纯粹的指称关系更为深刻,它包括最广泛意义上的语词的意象、感知的路径、意义组合的路径等。还有,语言都有其经验基础,表现出来的就是概念化,这也就是说,概念化与人类体验现实的方法密切相关,体验既有文化方面的,也有生理方面的。在这个意义上,认知语言学体现出来的是一个语境化了的意义的思想与观念。另外,还有其他语言理论推动了以意义为基础的语言学的发展,像韩礼德(Halliday)的系统功能语法理论。不过,无可置疑,认知语言学是这一研究导向的最为直接的样板。

第三,一些功能语言学家们的研究方法重新确立了语言运用与语言本体之间的关系,这些研究方法试图发现语言中激活话语的内在机制。<sup>[6]</sup> 这样,尽管话语不再仅仅是纯粹的语言规则的应用,但是语言又不得不满足话语功能,这恰恰激活了语言规则本身。比如,某种语言里存在的被动语态,可以解释为一种话题化的机制:语言里含有被动语态,是由于直接宾语的话题化在话语里是个很有用处的功能。认知语言学的模型就是以语言使用为基础的,<sup>[7]</sup> 尤其重要的是,这种理论模型还可应用于语言习得领域。这些研究发展出一个语言习得模型,语言习得的每个阶段都由儿童的语言知识与语言运

---

① 结构主义与传统语法论著并不试图去明晰地确立和分析语言中句子的结构,而着重于描写语言中的成分和各种词的分类。这类语法,在其组织结构与文字解释之中,往往隐含着人们已经具有了那些不言而喻的但是没有明确表达的原则。Chomsky的语言学理论就试图明确而清晰地表现与解释人类内在直觉的语法理解的能力。

用共同决定。言下之意,语言习得可以看成是儿童的语言以使用为基础的一步一步拓展开来的一个连续的过程。这样说来,这种语言是从儿童的语言交际运用中显露出来。最终,语言使用就成了语言变异过程中的一个日益重要的因素,有资可证,比如 Traugott所做的对语法化中说话人与听话人交流的角色探讨,<sup>[8]</sup> Croft提出的语言变异(尤其是语法变异)的应用基础模型,<sup>[9]</sup>以及 Bybee和 Krug等人对语言应用作为基本因素在语言变异中的固化与使用频率所做的大量研究等。<sup>[10]</sup>

总之,当代语言学表现出一个向语境化发展的趋势,语言必须放在语境中研究。如果能够认同这一说法,那么认知语言学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研究态势。因为,首先语言与概念化之间的相互影响是认知语言学的研究焦点,这就体现了语言研究的语境化。其次,通过发展语言结构的网络模型,认知语言学恢复了词汇作为其中一个相关结构层次的地位。第三,通过旗帜鲜明地对语言的应用属性的坚持,认知语言学也体现了当代语言学注重零散语言现象的学术潮流。在细节方面,某些语言学理论可能比认知语言学取得了更多的研究成果,但是,认知语言学的突出地位在于它整合了这些理论,并集中体现了当今语言学的研究趋势和发展动力,这一特征揭示了认知语言学成功背后的根本原因。

## 四、结论

认知语言学不是一个自我封闭的或已经完善的语言学学科。首先,正是因为其“认知”的性质,认知语言学才有了一个从心理学角度观察语言的研究态势。这就是说,在个体的心智中,语言是作为知识组织与建构的一个部分而存在的。<sup>[11]</sup>许多研究者都大力强调,认知语言学的经验主义本质不仅仅源于物质的实际属性(比如身体和生理上的“体验”),而且文化环境与语言的社会交际属性也是认知研究方法的基本要素。<sup>[12]</sup>有些研究人员将概念隐喻理论和文化模型理论运用于社会特征属性以及语言在其中扮演的角色的问题研究之中。<sup>[13]</sup>近来有研究指出,隐喻模型理论也很鲜明地体现出语言使用者对语言与语言变异所持有的信念。<sup>[14]</sup>在这一点上,认知语言学又与社会语言学发生了联系。

其次,认知语言学特别强调语言学的运用属性,就是说,语言研究需要重视的不仅仅是语法结构,还要考虑语言的实际运用,以及语法结构与实际语言运用之间的相互影响。许多学者都探讨过这一观点。<sup>[15]</sup>近年来,出现了大量以这一理论为框架的研究论著。<sup>[16]</sup>

最后,认知语言学如果是属于认知科学范畴的话,那么它自然而然就会运用其应用价值已经被认知科学广泛证明了的那些技术手段。<sup>[17]</sup>比如,实验心理学对认知的经验主义研究就有很悠久的历史。同样的研究方法也能够在认知语言学里得到很好的运用。目前,人们对语言学与神经科学的交叉联系的研究兴趣逐渐增加,比如以 George Lakoff和 Jerrold Feldman等的语言研究小组所提出的语言的神经理论就是代表。

总之,在我们看来,语言的认知分析得到越来越多的运用,也必将一直影响语言理论的建设,但认知语言学还远未成为一个统一的稳固的理论知识系统,目前其各个研究领域也还远远没有统一,仍然只是一个动态的理论研究框架,许多探讨也仅仅限于构想的层面,认知语言学确实更需要的是深入的个案研究及扎实的学术推进,而不是仅仅作为一个学术标签。虽然认知语言学理论研究的向度多样,我们仍然期待着理论上的统一,同时我们希望从事认知语言学的研究者不仅要把握认知语言学研究理论的不断变化,同时也要密切关注认知语言学的未来发展方向。

注释:

[1]王德春、张辉:《国外认知语言学研究现状综述》,《外语研究》2001年第3期;赵艳芳:《认知语言学研究综述》

- (一)、(二),《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0年第 5期、第 6期。
- [2] Chomsky N., *Language and Problems of Knowledge*,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88
- [3] 龚放:《认知语法的特点及与生成语法之比较》,《外语学刊》2001年第 4期。
- [4] Chomsky N., *The Logical Structure of Linguistic Theory*, New York: Plenum Press, 1975.
- [5] 冯志伟:《中心语驱动的短语结构语法》,《语言学问题集刊》(第一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
- [6] Givón, T., *On Understanding Grammar*,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9; Hopper Paul J. and Sandra A., “Thompson Transitivity in Grammar and Discourse”, *Language*, 1980, 56: 251–299; Hopper Paul J., “Emergent Grammar”, *Berkeley Linguistics Society*, 1987, 13: 139–157.
- [7] Barlow, Michael and Suzanne Kemmer, eds., *Usage-based models of language*, vii–xxviii Stanford, CA: CSLI Publications, 2000.
- [8] Traugott Elizabeth Closs, “Pragmatic Strengthening and Grammaticalization”, *Berkeley Linguistics Society*, 14: 406–416, 1988.
- [9] Croft William, *Explaining Language Change: An Evolutionary Approach*, London: Longman, 2000.
- [10] Bybee, Joan L., *Phonology and Language Us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Krug Manfred, *Emerging English Modals: A Corpus-based Study of Grammaticalization*,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2000.
- [11] 沈家煊:《语言的“主观性”和“主观化”》,《外语教学与研究》2001年第 4期。
- [12] Palmer Gary B., *Toward a Theory of Cultural Linguistics*,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96; Sinha Chris and Kristine Jensen de López, “Language, Culture and the Embodiment of Spatial cognition”, *Cognitive Linguistics*, 2000, 11: 17–41; Harder, Peter, “The Status of Linguistic Facts: Rethinking the Relation Between cognition, Social Institution and Utterance from a Functional Point of View”, *Mind and Language*, 2003, 18: 52–76; Ilkonen Esa, *What is Language? A Study in the Philosophy of Linguistics*, Turku, Finland: Abo Akademi Tryckerij, 2003; Tomasello Michael, *Constructing a language: A usage-based theory of language acquisi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 [13] Diven, René, *Language and Ideology*, Roskyn Frank and Comelia Ilie, eds., Vol. 2: *Descriptive Cognitive Approaches*,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2001; Diven, René, Roskyn Frank, and Martin Pütz, eds., *Cognitive Models in Language and Thought: Ideology, Metaphors and Meanings*,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2003; Diven, René, Bruce Hawkins, and Esra Sandkötting, eds., *Language and Ideology, Vol. 1: Theoretical Cognitive Approaches*,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2001.
- [14] Geeraerts, Dirk, “Cultural models of linguistic standardization”, In René Diven, Roskyn Frank, and Martin Pütz, eds., *Cognitive models in language and thought: Ideology, metaphors and meanings*,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2003, 25–68.
- [15] Langacker, Ronald W., *Concept, image, and symbol: The cognitive basis of grammar*,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1990; Kemmer, Suzanne and Michael Barlow, “Introduction”, In Michael Barlow and Suzanne Kemmer, eds., *Usage-based models of language*, vii–xxviii Stanford, CA: CSLI publication, 2000; Tomasello Michael, “First steps toward a usage-based theory of language acquisition”, *Cognitive Linguistics*, 2000, 11: 61–82; Tomasello Michael, *Constructing a Language: A usage-based Theory of Language Acquisi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Bybee, Joan L. and Paul Hopper, “Introduction”, In Joan L. Bybee and Paul Hopper, eds., *Frequency and the emergence of linguistic structure*,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2001, 1–24; Croft William and D. Alan Cruse, *Cognitive linguis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 [16] Verhagen, Arie and Joan van de Weijer, eds., *Usage-based approaches to Dutch*, Utrecht, Netherlands: LOT, 2003.
- [17] 蓝纯:《认知语言学:背景与现状》,《外语研究》2001年第 3期。

[责任编辑:廖哲平]

(英文摘要下转第 81页)

- [ 18 ] 参阅陈衍德:《贫困与东南亚国家的民族动乱——全球化进程中的经济—文化抗争》,《世界民族》2006年第 2 期。
- [ 19 ] S. C. 杜布:《发展的文化维度》,何素兰译,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社会转型:多文化多民族国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 217页。
- [ 20 ] 杨雪冬:《全球化:西方理论前沿》,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 77、95、38、82—83、83页。

[ 责任编辑:陈双燕 ]

## A Study on Models of Ethnic Relationship in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CHEN Yan-de<sup>1</sup>, PENG Hu<sup>2</sup>

( 1. History Department,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Fujian

2. History School, Huazhong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Hubei)

**Abstract** The complex ethnic composition of Southeast Asia has created local diversity of ethnic relationship. However “co-existence—separation” model can be used to study various ethnic relationship, in which cultural analysis is essential. The common history of this region has formed the cultural commonality and determined the basis of the coexistence of various ethnic groups. But the exclusive aspect of culture and ideological devia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of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have provided the possibility of separatism. In addition middle state of ethnic relations also exists. Under the conditions of globalization, the cultural elements highlight and strengthen the integrity and fragmentation of local culture in Southeast Asia, so that the local “co-existence—separation” model is more visible and inpeccable.

**Key words** Southeast Asia, ethnic relationship, “co-existence—separation” model

---

(上接第 19页)

## A Review on Cognitive Linguistics

FANG Huan-hai<sup>1</sup>, GAO Ming-le<sup>2</sup>

( 1. Overseas Education College,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Fujian

2. English Education Center,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 China)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study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has witnessed great progress in theoretical deduction and descriptive analysis. Although becoming an important theory of natural language study and analysis, it needs not only deeply case study but also a more profound understanding of its ontology. This article analyzes and comments on its theoretical guidance and development in the view of disciplinary definition, cognitive attribute and development trend. Binding the contents and methods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the article also introduces its theoretical features. Currently, cognitive linguistics, as a dynamic research framework, is still far from being a stable theoretical system.

**Key words** cognitive linguistics, subject characteristics, cognitive context, semantics